

◀ (上接 11 版)

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这个学习班对上海经济所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提高理论水平、研究能力相当有帮助。”“蝴蝶”在和平饭店扇了下翅膀,袁恩桢的学术生涯里便起了春风,他的学研思路就此打开。当时上课的情形袁恩桢还历历在目:“教授们教课都是第一流的,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加上《资本论》每篇都是名作,关于各种问题的解释、记忆要领,每个学生都密密麻麻记了几大本。这一年的学习甚至比大学四年更为受用,也是那一场学习让我深深意识到《资本论》中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经济是有用的。”袁恩桢坦言,他许多文章的灵感都来自那一年的学习——他的文集里有一篇《葡萄酒、工人视察员及其他》正是从那场《资本论》学习中抠出来的东西。

1964 年,研究所大批人员下乡参加“小四清运动”,袁恩桢因为身体较弱留守所内继续做研究。因为所里的学习活动几近停摆,袁恩桢就拾起幼时的爱好:写东西,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商品与价值、专业化与协作等方面的文章。袁恩桢自己也没有料到,这竟形成了他研究工作的第一个小高潮。“那时刊物很少,上海除了大学校刊,在全国有影响的就是《学术月刊》,当时在上面发一篇文章是相当不易。”在



姚耐

《学术月刊》上接连发表文章,让袁恩桢开始相信自己能在研究领域站住脚。然而他的雄心壮志被随后到来的“文革”打散了。“文革”当中,上海社科院被撤销,尽管秉持所学,袁恩桢还是做了些学术工作,但离经济研究是越来越远,10 年间他都没碰过他的专业领域,直到 1977 年重回经济研究所。想到刚回所里的那段时间,袁恩桢说:“总觉得有股力量推动我要把以往丢失的 10 年时间抓回来。”追赶着时间的袁恩桢迎来了他研究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袁恩桢文集》中有一篇《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且与《文汇报》颇有渊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又一次大讨论,而上海当时还未发出声音。《“文汇报”当时



雍文远

的总编辑马达,通过报社理论部的同志约我写一篇相关文章。那篇文章我写得相当苦,也相当急,上午拿到题目,下午在单位里找材料,晚上回家开始写。当时也没电脑,只能手写,也没打草稿,写到大概凌晨 4 点多,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白天送到了报社,次日就见报了。这个速度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十分难得的,当时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希望能为拨乱反正做点工作。”袁恩桢加班加点地写着文章,并没想到这些成果为他 1987 年直接跳过副研究员,破格升为研究员打下了基础。袁恩桢还记得,那会儿他有个“头衔”——上海社科院里年纪最轻的研究员。“张仲礼院长在院里大会上提到,上海社科院开始有了不到 50 岁的研究员。我后来发言时说,我 49 岁,也不年轻了,我们的研究人员不能总是熬到白发苍苍才可以做教授,这是研究工作因‘左倾’错误停滞产生的结果。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年轻的教授、研究员出来。现在也确实如此。”

“文革”结束后,姚耐受命恢复上海财经学院,曾试图拉他颇为看中的“小袁”回校,“小袁”却十分为难:“我一口宁波话,大学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听不懂,我怎么教课。”私心里,袁恩桢留恋社科院的氛围,对研究工作已经相当感兴趣,不愿离开了。“曾经听到有人评论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是闲差,我不这么认为。社科院尽管没有坐班制,但是相当辛苦,没有休息日、没有晚上,只要有空就在做研究。”袁恩桢说自己最怕空闲,社科院的节奏倒正合他的胃口。只是常年埋头于各种材料之间,这份辛苦让袁恩桢落下了眼疾,时间一长就要拭泪。“辛苦归辛苦,比不得研究带来的乐趣,若是发现新的东西就更有乐趣。”享受着研究中的乐趣,袁恩桢的著述也由薄变厚,为学界所知,为国家建设所用。《社会必要产品论》是上海经济研究所集中理论经济



王惟中

学研究的主要力量,用了两年时间完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也是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部著作。1983 年春节这部著作在北京立项时,袁恩桢就在现场。在该书后续的编写中,他也担纲了重要角色,他还是主编雍文远指定的助手之一。这本《社会必要产品论》集合了学术团队众多人的创意,袁恩桢的贡献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商品两重性的观点。直至今日桃李满园,在学界备受推崇,对于这一贡献袁恩桢仍是不敢居功:“这是雍文远教授创立的,我把它发挥出来。”采访中,袁恩桢从不提自己首创了什么,又率先发现了什么,他说,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都是相互搭界的,都是站在彼此肩膀上。

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相伴 50 多年,袁恩桢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研究热情。在他眼中,这就是事业。即便在担任经济所所长的多年间,他也没断了研究,他甚至把所长不得不去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都看作是一种社会调查,作为一份材料融于研究工作当中。他还天生“神技”,可以利用琐碎的时间写文章,思路不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时间紧迫,他心中的事业又任重道远:“我感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很好地完成,还是在探索的阶段。我知道这条路相当漫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的力也只能是那么一点点,但即便如此,作为个人也要全部贡献出来。”

主张“双强”:袁恩桢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治学多年,袁恩桢的研究侧重很能反映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



沈志远

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袁恩桢在研究中一直保持初心,却也不固步自封。

上世纪 60 年代,袁恩桢研究的内容只有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为主再涉及分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念,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是以所有制为起点。”然而到了“文革”时期,生产力论一度受到指摘,搞生产的更是被作为批判对象,生产关系被进一步引向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较之前丰富了许多。“首先是恢复了生产力论,把生产力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之一”,袁恩桢说,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商品生产理论也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当前这段时期在袁恩桢眼中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归:“还是研究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当然它是联系生产力、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的。”前年袁恩桢在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话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学习应有三维对象,即当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维度”。他说,从总体来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要开始研究改革的问题。“改革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我想这个思路是跟当下相吻合的。”

袁恩桢从专业角度解析了此次复归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从两个角度研究:“首先,我们改革过程当中,改革的导向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在这个过程中要改善政府跟市

(下转 13 版) ▶



1979 年,袁恩桢在《文汇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参与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